

我国税收负担对经济增长影响的经验分析^①

李永友

(安徽财经大学 财政税收系,安徽 蚌埠 233041)

摘要:文章在总结既有研究的基础上,把财政支出纳入到了税收负担分析的框架内。通过对我国经验数据的实证分析,发现我国的税收负担即使在考虑政府支出的情况下对经济也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但这种抑制程度在两种情况下有着很大的差异。在不考虑政府支出时,税收负担每提高一个百分点,经济增长就会下降0.713个百分点。但在考虑到财政支出之后,税收对经济增长的抑制程度由原来的0.713个百分点下降到0.33个百分点左右。遵循同样的分析思路,文章还通过对巴罗模型的扩展计算了我国现阶段最适的税收负担水平。通过计算得出当前我国中口径的税收水平在不考虑政府支出时大致为18.6%,但考虑到政府支出的作用后,中口径的税负水平上升至20.3%左右。

关键词:私人部门;税收负担;经济增长

中图分类号:F812.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9952(2004)12-0053-13

一、引言

随着现代税收理论研究中心从片面强调筹集财政收入功能转向重视税收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税收负担对社会经济生活和国民经济运行的影响就充分地显露了出来。宏观经济运行和促进经济增长必须要解决的一系列基本问题无不与税收负担有着直接而又紧密的关系。特别是随着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和经济全球化程度的提高,激烈的税收竞争更使得税收负担设计成为各国参与世界经济竞争的一项重要政策变量。正是由于这些原因,税收负担问题也就成为了各国税制改革和税收政策选择的一个核心问题。

审视我国的税收负担^②状况,从绝对量上看,从1994年到2003年,短短10年时间,我国的税收收入增长了近4倍,由1994年的5126.88亿元上升到2003年的20450亿元^③。从相对量上看,小口径的税收负担也由1994年的11%上升到2003年的17.5%,10年上升了6.5个百分点。税收年均增长率达

收稿日期:2004-09-12

作者简介:李永友(1970—),男,安徽巢湖人,安徽财经大学讲师,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博士生。

20%以上。2004年这一比例更高,从国家税务总局的统计数据看,2004年1~6月份,税务部门共征收税收13 000亿元左右,同比增长26%。如此高的增长速度,人们不禁要问,我国私人部门的税收负担是不是加重了,税收负担的上升对经济增长是否有影响,且这种高增长的收入筹集机制是否可持续等,这一系列问题都值得我们做进一步的研究。

对于这一系列问题,国内许多学者曾进行了研究。刘溶沧、马拴友(2002)通过对中国数据的计量分析得出,增加对资本课征的税收负担会降低投资率和全要素生产率,但不影响劳动供给,从而对经济增长具有负效应;增加对劳动课征的税收负担会降低投资率,通过收入效应刺激了劳动供给,但对技术进步没有影响。由于我国劳动供给过剩,经济增长主要来源于投资,因此增加对劳动课征的总效应是降低经济增长;增加对消费支出的课征,提高了投资率水平,不影响劳动供给,同时与全要素生产率正相关,最终效应是不阻碍经济增长,甚至有弱的证据表明它可促进经济增长。对于这个原因,他认为主要是由于我国的收入水平较低,税收的替代效应即增加税负促使人们以闲暇替换劳动不明显,增加对消费的课税没有降低劳动供给,因此对经济增长没有负作用^④。郭庆旺(2002)则通过对1994年税改以来税收收入变化的分析,研究了1994年税改以来我国税收负担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分析得出在不考虑财政支出增长效应的情况下,税收收入的连年超常增长是不利于经济增长的。他认为这种情况主要是由于:企业所得税的增收会降低企业盈利水平、抑制民间投资;个人所得税的增收会降低劳动收益率,抑制劳动供给;增值税和营业税的增收会抑制民间消费。这在我国长期处于消费不旺、储蓄过剩的情况下不利于解决供给大于需求问题。通过计量分析作者进一步说明了两者间存在的数量关系,这就是在各模型的宏观税负系数中,东部地区的系数为0.67,中部地区的系数为-0.301,西部地区的系数为-0.14,而以中部地区最低。这表明,尽管中西部地区的宏观税负比东部地区还低8.5个百分点和6.1个百分点,但就是这样低的宏观税率对经济增长的抑制效应仍然很大;各模型的边际宏观税率均为负值,东部地区系数为-0.031,中部地区系数为-0.016,西部地区系数为-0.039。这表明,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税收增长对经济增长的抑制效应很大;中部地区的税收增长对经济增长的抑制效应相对较小,很可能是因为中部地区的税收增长率不仅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而且还低于西部地区的税收增长率^⑤。安体富、岳树民和袁有杰(2002)则从宏观税负的定義入手,通过对税收负担与经济增长相关系数的分析得出我国宏观税负与经济增长也呈负相关关系,且相关系数达-0.894。同时作者还利用了我国1979年到1999年20年的统计数据对影响程度进行了回归分析,回归的结果得出的结论是:我国税收对经济增长具有负影响,从数量上看,税收每增加1 000元,GDP大约减少2 300元^⑥。

由上文献分析可见,我国的经验数据所得出的结论总体上进一步支持了马其顿(1983)当年的研究结论,即税收负担与经济增长呈现出显著的负相关^②关系。问题是上述的研究虽然论证了税收负担与经济增长的负相关关系,但这种影响程度仅仅体现了小口径税收负担对要素投入或经济增长的影响程度。实际上,在我国由于小口径税收收入并不能真正反映私人部门的税收负担,真正体现私人部门负担水平的是大口径的税收负担水平(安体富,1999)。因此仅仅研究小口径的负担水平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不准确的,必须把整个政府收入水平作为研究对象^③。同时他们的研究还存在的一个问题是,研究税收负担问题时都没有考虑财政支出的影响。我们知道税收是财政支出的成本补偿,而财政支出又是提高私人部门效率的重要手段。一般来说,财政支出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龚六堂、邹恒甫,2002)。如果仅考虑税收对经济的抑制作用,而不考虑财政支出对经济的促进作用,这样分析税收负担的影响是不全面的,也是不科学的。为了弥补不足,本文将财政支出纳入了税收负担的分析框架内,研究了我国中口径的税收负担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程度,并在此基础上通过对巴罗模型的扩展,利用计量手段计算了我国当前最适的税收负担水平。

二、经验分析

这里首先仅从税收负担与经济总量间的关系出发,在不考虑财政支出的情况下考察税收负担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其次把财政支出纳入计量分析的框架内,重新考察税收负担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在对变量间的关系进行计量分析前,必须首先要对这三者进行因果关系检验。因为如果这些变量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那么变量间的回归就可能存在伪回归问题^④,这样得出的变量间关系也就没有实际意义。在明确变量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后,再进一步分析变量间的影响程度。

为了使分析更能反映我国市场化进程中税收负担水平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分析中所利用的是1979年至2002年的改革开放后的时间序列数据,同时为消除价格因素的影响,所有的绝对数据都采用了真实值^⑤。由于没有可靠的制度外收入纪录,所以在税收负担的统计上,分析只采用了财政预算内外收入之和来表示私人部门的税收负担,也就是一般意义上的中口径税收负担。为了保持收支的对称性,财政支出也采用预算内外支出的总量。另外为保持统计数据的一致性,本文所采用的数据都是来自于《中国统计年鉴2003》。

根据计量分析的一般常识,在进行变量间因果关系检验前,首先对变量进行单位根检验,因为从变量序列上看,序列都呈现出一种趋势增长的特征,显然,根据序列平稳性的含义可知序列是非平稳的。既然序列是非平稳的,这样我们就不能直接对变量进行简单的回归分析。但只要能够通过单位根检验判

断出变量间是同阶单整的,我们才可以对变量进行回归分析。因为只有同阶单整序列之间才可能存在长期的协整关系^④。

经过上面的数据处理,依据上述思路,我们首先运用 eviews3.1 对序列进行单位根检验。检验结果如下:

表 1 序列的单位根检验

变量	检验形式	ADF 值	1%临界值	5%临界值	10%临界值
lnGDP	(0 0 2)	3.068690	-2.6819	-1.9583	-1.6242
	(c 0 2)	-1.584229	-3.7856	-3.0114	-2.6457
	(c t 2)	-2.322621	-4.4691	-3.6454	-3.2602
lnZFSR	(0 0 0)	5.673767	-2.6700	-1.9566	-1.6235
	(c 0 0)	0.170584	-3.7497	-2.9969	-2.6381
	(c t 0)	-2.260231	-4.4167	-3.6219	-3.2474
lnZFZC	(0 0 0)	5.858952	-2.6700	-1.9566	-1.6235
	(c 0 0)	0.573325	-3.7497	-2.9969	-2.6381
	(c t 0)	-2.474959	-4.4167	-3.6219	-3.2474

其中,lnGDP、lnZFSR 和 lnZFZC 分别代表 GDP、中口径税收和政府预算资金支出。通过序列的单位根检验,根据 AIC 和 SC 的值选出了最可靠的检验结果,检验结果进一步证实了我们原先的判断,序列是非平稳的,因此对变量我们就不能运用简单的回归手段进行分析。必须要通过进一步的检验考察序列是否是同阶单整,通过不断的尝试,在经过一阶差分之后发现三个序列是平稳的。具体的检验结果如下:

表 2 序列的一阶差分单位根检验

变量	检验形式	ADF 值	1%临界值	5%临界值	10%临界值
lnGDP	(0 0 1)	-4.337212	-2.6889	-1.9592	-1.6246
	(c 0 1)	-3.811780	-3.7856	-3.0114	-2.6457
	(c t 1)	4.113388	-4.4691	-3.6454	-3.2602
lnZFS	(0 0 0)	-2.325076	-2.6756	-1.9574	-1.6238
	(c 0 0)	-4.653165	-3.7667	-3.0038	-2.6417
	(c t 0)	-4.555255	-4.4415	-3.6330	-3.2535
lnZFZC	(0 0 0)	-2.280048	-2.6756	-1.9574	-1.6238
	(c 0 0)	-4.880125	-3.7667	-3.0038	-2.6417
	(c t 0)	-4.833289	-4.4415	-3.6330	-3.2535

表3 序列的因果关系检验

零假设	Obs	F 统计量	概率
LNZFSR does not Granger Cause LNGDP	23	4.61024	0.04422
LNGDP does not Granger Cause LNZFSR	23	0.14674	0.70571
LNZFZC does not Granger Cause LNZFSR	21	3.99206	0.03013
LNZFSR does not Granger Cause LNZFZC	21	3.20296	0.05608
LNZFZC does not Granger Cause LNGDP	23	5.23826	0.03311
LNGDP does not Granger Cause LNZFZC	23	0.40608	0.53119

既然序列都是一阶单整,现在就可以对变量进行因果关系检验了。变量间因果关系检验结果如表3所示。

检验结果显示,当 p 取1时,私人部门的税收负担在5%的水平上是经济总量波动的原因,不过让人感到奇怪的是,我国的经济增长不管在 p 为何值时都不是私人部门税收负担变化的原因,这说明了一个引人注意的现象,就是我国近几年税收的超常增长所导致的税收负担上升并不是因为经济的原因,相对于过去,可能更多地是来自于经济以外的原因引起的,比方说征管力度的加强以及税收政策的变化、经济结构的调整等。在 p 取3时,私人部门的税收负担是政府预算支出需要波动的原因。而政府预算支出需要在 p 取3时,却在10%的水平上才是私人部门税收负担变化的原因,这说明改革开放以后,我国财政以收定支的特点比较明显,显然这和公共财政下以支定收的思想有点不太吻合。当 p 取1时,政府预算支出在5%水平上是经济增长波动的原因,但检验的结果显示,这两者之间在10%的水平上并不存在反向因果关系。这说明马斯格雷夫财政支出的经济发展阶段论在我国并不存在。

既然变量间存在一定的因果关系,那么接下来就是考察变量间这种因果关系的影响程度。首先考察在不存在政府预算支出的情况下,私人部门的税收负担高低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程度。其次,再把政府预算支出纳入分析框架内,考察在考虑政府预算支出影响的情况下,私人部门的税收负担高低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为此我们同样利用eviews3.1对序列进行了分析,但在对序列进行ols处理时,发现方程存在异方差和序列相关^⑨,通过对异方差和自相关的消除,最后的计量分析结果见表4所示。

分析结果显示,t和F统计量都表明模型中各变量的系数显著异于0。同时经修正后的模型已经不再有异方差和自相关存在,从拟合优度看,模型的拟合效果较好。从解释变量的系数看,在不考虑政府预算支出的情况下,私人部门的税收负担对经济增长的长期影响是-0.007127。也就是说,私人部门的税收负担每上升1个百分点,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使经济增长率下降约0.713个百分点^⑩。这种影响相对于OECD国家-0.6~0.7的经验数据略大

表 4 变量间的计量分析结果

参数	没考虑政府预算支出的情况	考虑政府预算支出的情况
C	8.418486(19.281.55)	8.106588(79.45592)
T	0.086452(173.6424)	0.092438(17.93835)
ZFSRFD	-0.007127(-12.76940)	-0.003131(-1.887020)*
ZFZCZB		0.005247(2.621798)**
R-squared	1.000000	0.998802
Adjusted R-squared	1.000000	0.998550
Durbin-Watson	1.961248	1.434047
F-statistic	6156.123	3959.928
Prob(F-statistic)	0.000000	0.000000

说明: ZFSRFD 和 ZFZCZB 分别表示私人部门的税收负担和政府预算支出占 GDP 的份额。这时的因变量是真实 GDP 对数。* 在 10% 的水平上显著, ** 在 5% 水平上显著。一点(卡拉斯, 1999)。但在考虑到政府预算支出对经济增长的正向促进作用后, 作为政府预算支出成本补偿的税收, 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明显小了许多, 由原来的 0.713 下降到 0.313。这说明单纯地考虑税收负担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会夸大税收负担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

这里仅仅考虑的是私人部门平均税收负担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其实从税收对私人经济行为的影响看, 边际税收负担和平均税收负担相比要显得更为重要。因为在保持边际税负不变的情况下, 主要通过收入效应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而边际税负在保持平均税负不变的情况下, 则主要通过替代效应产生作用。显然从效率损失的角度讲, 替代效应要大于收入效应。因此, 在分析我国税收负担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时, 仅考虑平均税收负担显然不能完全反映税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因为从平均税收负担的国际横向比较看, 我国的平均税收负担要远低于西方发达国家, 即使和发展中国家相比, 我国的平均税收负担也并不显得很高(李永友, 2002)。但从这几年的税收超常增长看, 我国的平均税收弹性却一直保持在 1.96 左右(林鲁宁, 2002), 这说明从边际税收负担看, 我国经济每增长 1 个百分点, 税收就会增长 1.96 个百分点。显然从另一个角度说明, 从整个经济体看, 我国经济的边际税收负担是非常高的。那么这么高的边际税收负担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如何也应值得我们认真分析, 以此判断我国近几年的税收超常增长对经济的影响程度。为此, 首先在不考虑政府边际支出的情况下对 1979 年至 2002 年的边际税收负担与经济增长的长期关系进行 ols 估计, 其后再把政府边际支出纳入分析框架内, 分析在考虑政府边际支出的情况下边际税收负担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但在对方程进行自相关检

验时,发现估计残差序列存在自相关^⑨。为此同样利用 Cochrane-Orcutt 迭代法对方程进行自相关消除,消除后的估计结果如表 5 所示。

表 5 边际税收负担对经济增长的影响(1979~2002 年)

参数	不考虑政府边际预算支出的情况	考虑政府边际预算支出的情况
c	8.212947(294.8638)	8.170156(171.5738)
T	0.091051(58.82148)	0.092511(32.81209)
BJSSFD	-0.000998(-2.204868)*	-0.000598(-2.477669)*
BJZFZC		0.000239(2.735274)*
R-squared	0.999294	0.998405
Adjusted R-squared	0.999059	0.998051
Durbin-Watson	1.998417	1.733254
F-statistic	4247.955	3611.814
Prob(F-statistic)	0.000000	0.000000

说明:BJSSFD 和 BJZFZC 分别表示边际税收负担和边际政府预算支出占 GDP 的比重,这里都是名义量之比,由于是相对量,所以也就不存在名义量与实际量之间的调整。这里的因变量是真实 GDP 的对数。* 在 5%水平上显著。

估计结果显示,从 1979 年至 2002 年,我国的边际税收负担对经济增长也呈现出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在没有考虑政府边际预算支出的情况下,边际税收负担对经济增长的抑制作用是:边际税收每上升 1 个百分点,经济增长率就会下降约 0.1 个百分点。当考虑到政府边际支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后,边际税收负担对经济增长的抑制作用明显小了许多,由原来的 0.1 降到了 0.06。这和平均税负一样,不考虑政府支出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单纯讨论税收负担会夸大税收负担的负面作用。但令人奇怪的是:相对于同期的平均税负,边际税负对经济的抑制作用要小得多。这种情况出现的原因可能是因为,一是与序列的时间选择有关。从 1979 年到 1994 年我国的税收弹性只有 0.66(这里排除了 1985 年的特殊情况),同期的边际税负只有 9.28%。只是从 1995 年开始,我国的边际税负才开始快速上升,从 1995 年开始,每年的边际税负都保持在 20%以上,8 年平均边际税负达到 24.17%,远远高于同期的平均税收负担,正是由于边际税负的上升,使得同期的平均税负也保持逐年递增的增长态势。边际税负的上升使得同期的税收弹性也由前期的平均 0.66 上升到 1.96。因此如果我们把时间期限缩短到 1995 年至 2002 年,情况可能就不是这样。但由于样本点太少,这里我们无法利用计量模型进行分析。二是与我国目前较低的收入和盈利水平有关。因为在较低的收入和盈利水平下,人们更关心平均税负,而对边际税负并不敏感(蒋洪,1996)。

三、我国最适宏观平均税负水平的估计

既然税收负担对经济增长具有抑制作用,那么单纯地从税收角度谈论经

济增长,显然最适税负就是0税负。然而当考虑到公共服务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后,0税负就不再是最适的了。这时的最适税负在考虑到政府的公共提供后,就是使私人部门的税收负担处于这样一个水平上,即税收对经济的抑制作用与公共服务对经济的促进作用达到一种均衡状态,在这种均衡状态下,使私人部门所感受到的综合效用损失最小。用英国经济学家哥尔柏的话说,就是“拔最多的鹅毛,听最少的鹅叫”^⑧。

对于我国的适度税负水平,国内也由许多人进行了研究。尤象都(1997)从私人部门的角度,利用马克思的社会再生产理论研究了我国税收负担水平的上限。通过研究,他认为整个社会的最高税负不能超过整个社会所创造的剩余价值。因为根据马克思的社会再生产理论,如果税负再高就会危及到社会再生产的正常运行和劳动力的生存需要,从而破坏了社会的再生产^⑨。实际上这种分析只是给出了税收负担的最高界限,对于最适税收负担的确定几乎没有指导意义。杨斌(1998)从我国转轨经济的政府职能出发,研究了当前税负水平的宏观和微观效果,通过分析,他认为从总体上看,我国的税负水平还比较低,无法为政府实现其职能提供所必需的资金保障。由于他所研究的对象是1998年之前的税收经济状况,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相对于他所研究的时期,经济环境和税负水平都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因此我们无法再套用他的分析来指导实践工作。同时他的分析也没有就最适税负水平给出一个定量的解释。马栓友(2002)利用巴罗模型,通过对历史数据的计量分析,得出了我国的最适税负是20%左右。但由于没有考虑到财政支出的作用,所以得出的结论可能低估了最适的税负水平。除了这些对整个宏观税负进行分析外,还有就具体的课税对象的税负水平进行分析^⑩。但由于只是就一个局部进行分析,所以得出的结论不具有适用性,同时由于分析都是仅针对税收的负面效应,没有考虑到公共部门支出行为对提高私人部门经济效率的作用,所以往往夸大了税收的负面影响,无形中低估了与经济增长相适应的最适税负水平。

从国外的研究来看,税收政策中所存在的“度”也一直是经济学的研究对象。1991年斯卡利利用了103个国家1960年至1980年的数据进行了分析,计量结果显示,当经济增长率达到一定的水平后,如继续增加税收负担,经济增长率就会趋于下降,然后就是负增长。通过对美国的实证考察,他发现当宏观税负超过23%时,美国的真实经济增长率就下降。

为了能确定我国的最适税收负担水平,本文将巴罗(1990)的模型为基础,利用我国的经验数据,在考虑公共支出的情况下讨论我国最适的税负水平。巴罗的模型是用税收负担和物价两个变量作为解释变量,利用ols对经济增长率进行回归,具体模型是:

$$GDPZZL = \beta_0 + \beta_1 LN(SSFD) + \beta_2 SSFD + \beta_3 LN P + \beta_4 ZCZ + \mu_1$$

其中,P表示价格水平,lnP表示经济周期对经济增长率的影响;zczbz表

示总的政府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主要反映总支出对经济增长率的影响。原来的方程并没有考虑政府支出对经济增长率的影响,这里只是为了下面分析的需要对模型进行了一定的扩展;ssfd 和 lnssfd 分别表示税收负担水平和变动率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要求出这里的最高经济增长率,我们只需对方程求导即可。也即经过一阶导数为 0,可以求出最适的税负水平。计算公式为:

$$\frac{\partial \text{GDPZZL}}{\partial \text{SSFD}} = \beta_1 / \text{SSFD} + \beta_2 = 0$$

根据这个式子求出的税负水平就表示在综合考虑政府收支的情况下,政府收入的最适限度。这个限度就是:

$$\text{SSFD} = -\beta_1 / \beta_2$$

下面我们分别就两种情况下的税收负担进行分析。分析采用的数据是从 1985 年至 2002 年的数据(这里之所以没有采用前面 1979 年至 2002 年的时间数据,是因为没有找到 1979 年至 1984 年 P 的数据),其中 GDP 增长率为采用平减指数消除后的真实增长率,P 用消费物价指数来表示。计量结果见表 6 所示。

表 6 最适税负水平的估计

参数	不考虑政府预算支出的情况	考虑政府预算支出的情况
C	10.82971(12.14892)	8.267563(14.25865)
T	0.098049(18.2674)	0.097476(28.43941)
LNSSFD	3.537421(2.839408)	0.298545(-2.027245)**
SSFD	-0.187900(-3.502404)	-0.014719(4.133069)
LnP	-1.651703(-2.176835)**	0.235263(2.444553)*
ZFZCZB		0.033475(2.949534)*
R-squared	0.942748	0.999077
Adjusted R-squared	0.925132	0.998692
Durbin-Watson	1.386490	1.555240
F-statistic	53.51679	2596.781
Prob(F-statistic)	0.000000	0.000000

说明:为了保持和前面论述的一致,在上述的两个估计方程中,税收负担水平仍然采用的是中口径的宏观税负水平,相对应,财政支出采用的是政府预算内外支出之和。同时在估计方程时,文章采用了变相的处理,即利用的是真实 GDP 的对数作为被解释变量。这样考虑一方面和前面的分析相一致,另一方面也是因为 GDP 的对数经一阶求导后,正好就是经济增长率。这样处理对研究的结论并没有影响。* 表示在 5% 水平上显著异于 0,** 表示在 10% 的水平上显著。两方程经检验不存在异方差和自相关。所有数据都来自于《中国统计年鉴 2003》,其中真实 GDP 是经 GDP 平减指数消除后计算所得。

从估计方程各统计量的结果看,各变量的系数显著不等于 0,从拟合优度看,两方程拟合得较好。既然如此,根据前面最适税负水平估计的计算公式,

可以计算出,在不考虑政府预算支出的情况下,最适税负水平 $ssfd=3.54/0.19$,约等于 18.6,在考虑政府支出的情况下,最适税负水平 $ssfd=0.299/0.0147$,约等于 20.3。这和马栓友计算的 18 左右的水平基本一致,但所不同的是,马栓友使用的经验数据是本文所指的小口径税收负担,所以得出的最适的税收负担也仅仅是针对小口径而言。由于本文所采用的经验数据是中口径的税收负担,所以得出的最适税负水平却是针对中口径而言。同时从两个方程所计算出的税负水平来看,考虑政府支出的情况下,经济获得最大增长率所要求的税负水平的确高于单纯考虑税收的情况,尽管高出的并不是很多。对照计算出的最适税负水平,评判我国现在的税负水平可以看出,2002 年我国小口径的税负水平是 16.83,中口径的税负水平却是 22.33。显然目前的水平不管是以马栓友的小口径水平还是以本文计算的中口径的税负水平为标准,都还基本上保持在最适水平上。

四、政策建议

计量分析的结论已经表明,在我国,税收负担水平与经济增长呈现出显著的负相关关系,两者的长期关系是税收每上升 1 个百分点,经济增长率就下降 0.7 个百分点左右。这要超出国外经验数据分析的结论。虽然国与国之间因许多因素负担水平的高低不能完全可比,但这种差异还是应该值得关注,特别在全球税收竞争日趋激烈的情况下尤为如此。

最适税负水平的测定向我们表明,目前不管是小口径的宏观税负,还是中口径的宏观税负都已接近或超过了我国目前的最适税负水平。这说明从促进经济增长的角度看,在考虑到财政支出对经济增长的正向作用后,我国目前不存在提高税负的理由。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把促进经济增长作为财政政策的首要目标,那么在目前情况下,我们就应该把税收负担控制在最适水平范围内。

但是不能提高税负就不等于要降低税负。虽然计量分析的结论证明,降低税负可以提高经济主体要素投入的积极性,提高经济增长的动力(刘溶沧、马栓友,2002)。但是根据我国当前的现实,我国目前还不存在减税的空间。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伴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和世界经济竞争的日趋激烈,市场化进程中还有许多事需要政府去做。特别是对一个刚刚由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大国经济而言。二是当前的收支矛盾同样没有给减税留下任何余地,统计数据显示,从 1998 年到 2003 年,我国财政赤字年均增长 43%^⑨。当年财政赤字占 GDP 的比重 2003 年已达到 3% 以上,债务余额占 GDP 的比重已超过了 20% 以上,当年的中央财政的债务依存度已经超过了 70%,除了这些显性债务之外,政府还背着许多隐性债务(刘尚希,2003),随着这些债务的增加,财政的风险也在不断地积聚。在这种背景下,再谈减税实际上是不可行的。

然而既不增加税负又不能降低税负,并不等于税收政策无所作为。面临世界性的减税浪潮,我国目前税收政策的思路应实行有增有减的结构性税收政策调整。首先,依据关贸总协定,对内外资企业应实行国民待遇原则,也就是说,应减少对外资企业的过分优惠,实行内外一致的税收政策;同时严格税收的执行,降低税收乱优惠的程度,保证税收政策全国执行的统一性。其次,降低正税之外的政府收费规模,降低费挤税的程度,提高财政统筹资金的能力,降低私人部门的收费负担。再其次,就是调整目前的税收政策,因为目前实行的还是1994年的税收政策,但相对于当时税改的背景,现在的形势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原有税制中不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那些规定,应得到修订,使税收制度能与经济社会发展形势保持一致。这里的修改主要包括,改变消费税的征税科目,扩大增值税的课征范围,实行消费型增值税,同时实行城乡税收的一体化,完善地方税制建设等。最后就是严格税收执法,加强税收征管。这里的税收执法就是充分保障纳税人权利的实现,比如出口退税的按时执行等,目的在于尽量降低纳税人的税收成本。加强征管在于严厉打击各种偷税、骗税行为,这一方面可以保证竞争的公平性,另一方面可以增加财政的税收收入,保证应收尽收。

注释:

- ①本文所指的私人部门是与公共部门相对应的。虽然公共部门所发生的购买性支出也会承担一部分税收,但在剔除掉各种公共部门工资福利开支后,真正参与市场交易的公共支出所承担的税收份额是非常小的,所以这里就近似地用税收收入表示私人部门税收负担。这里的税收收入是指税务部门收取的收入。
- ②根据中国人民大学安体富教授对税收负担的解释,税收负担在我国有大、中、小口径之分,大口径的税收负担是指政府收入占GDP的比重;中口径的税收负担是指财政预算内外收入总和占GDP的比重;小口径的税收负担仅指税收收入占GDP的比重。这里所指的税收负担是小口径的税收负担。参见安体富(1999)《税收负担研究》。
- ③2003年的税收数据中不包括关税和农业四税。
- ④刘溶沧、马拴友:《论税收与经济增长——对中国劳动、资本和消费征税的效应分析》,《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1期。
- ⑤郭庆旺:《税收增长与经济增长的互动影响研究》,http://www.bjsat.gov.cn/content-page/cn10104.jsp 2002。
- ⑥安体富、岳树民和袁有杰:《在加入WTO后的中国税收负担与经济增长》,《公共经济评论》2002年第9、第10期。
- ⑦Marsden, K. Links Between Taxes and Economic Growth: Some Empirical Evidence, World Bank Staff Working Papers, No. 605, 1983。
- ⑧研究小口径税收负担的问题在于,仅从小口径税负看可能有增加的趋势,但从私人部门整体负担状况看,可能并没有增加,或者增加程度更高,这里面存在税费间的转化。例如,从1994年虽然小口径的税收负担在大幅增加,但实际上,私人部门的整体负担状况可能增加

得并没这么大,这里面存在费转化成税的情况,也即费基在缩小,而税基在扩大。

- ⑨古扎拉蒂:《计量经济学》第三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3 年。
- ⑩这里的消除是以 1978 年为基年的 100,根据《中国统计年鉴 2003》中给出的 GDP 指数计算出各年的真实 GDP,再根据 GDP 平减指数计算公式,计算出各年的 GDP 平减指数,最后利用 GDP 平减指数消除掉政府收入,政府支出中价格因素的影响。同时分析中所采用的数据都是来自于《中国财政年鉴 2003》、《中国税务年鉴 2003》、中国经济信息网。
- ⑪尽管同阶单整序列间可能存在协整关系,通过线性方程建立变量的线性关系,但要真正判断变量间是否存在长期关系,还得对线性方程的残差序列进行平稳性检验,如果经检验证明是平稳的,就说明变量间存在真正的长期协整关系,否则还是不能说明两者间存在长期关系。
- ⑫在不考虑政府预算支出的情况下,方程的异方差(White 检验)和自相关(LM 检验)检验的结果分别是 8.721825 和 16.75902,相伴概率分别是 0.068441 和 0.000230($p=2$)。在考虑政府预算支出的情况下,方程的异方差和自相关检验的结果分别是 16.44220 和 13.63455,相伴概率分别是 0.011567 和 0.001095($p=2$)。为了消除异方差的存在,文章采用了 WLS 进行消除,权重为残差平方的倒数,对自相关文章采用了 Cochrane-Orcutt 迭代法进行消除。
- ⑬这里是由于因变量经一阶导数后正好表达的是经济增长率,但所求出的增长率是小数的形式,而自变量采用的是百分数的形式,所以为了口径的统一,在分析时必须把经济增长率也转换成百分数的形式。以下如不特别声明,都是这样处理。
- ⑭不考虑政府边际支出时,方程的 LM 统计值为 7.126665,相伴概率为 0.028344($P=2$)。考虑政府边际支出的情况下,方程的 LM 统计值为 14.05410,相伴概率为 0.000888($P=2$)。
- ⑮转引自 Alan J. Auerbach & Martin Feldstein:《Handbook of Public Economics》Volume Elsevier Science Publishers B. V. 1985。
- ⑯尤象都:《关于合理税收负担的基本分析》,《税务研究》1997 年第 7 期。
- ⑰王芳:《中国上市公司所得税税收负担问题研究》,《经济研究》1995 年第 5 期;高淑泽:《初探国有企业的合理税收负担》,《山西财经大学学报》1995 年第 4 期。
- ⑱根据《中国统计年鉴 2003》计算所得。

参考文献:

- [1] A. B. Atkinson. Modern Public Finance[M]. Volume I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Company, 1991.
- [2] Alan J. Auerbach & Martin Feldstein[M]. Handbook of Public Economics, Volume I Elsevier Science Publishers B. V., 1985.
- [3] 蒋洪. 财政学教程[M].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6.
- [4] 刘飞鹏. 税收负担理论与政策[M]. 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5.
- [5] 马栓友. 税收政策与经济增长[M]. 北京:中国城市出版社,2001.
- [6] 古扎拉蒂. 计量经济学[M]. 第三版,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 [7] 易丹辉. 数据分析与 Eviews 应用[M]. 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2.
- [8] 石恩祥,郑卫东. 税收负担理论分析与数量界定[J]. 经济体制改革,1998,(2).

- [9] 尤象都. 关于合理税收负担的基本分析[J]. 税务研究, 1997, (7).
- [10] 杨斌. 宏观税收负担总水平的现状分析及策略选择[J]. 经济研究, 1998, (8).
- [11] 岳树民, 安体富. 加入 WTO 后的中国税收负担与经济增长[J].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 2003, (2).
- [12] 林鲁宁. 我国宏观税收负担: 实证分析与思考[J]. 财经理论与实践, 2002, (6).
- [13] 石恩祥, 林静. 企业税收负担及总体负担的实证分析[J]. 税务研究, 1999, (5).
- [14] 安体富, 石恩祥, 杨文利. 关于税收负担问题的研究报告[J]. 税务研究, 1999, (5).

An Empirical Analysis of the Effects of Tax Burden of Personal Section on Economic Growth in China

LI Yong-you

(Department of Public Finance and Taxation, Anhu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Bengbu 23304,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existing research, the paper brings the government expenditure into the analytic framework of tax burden. Through empirical analysis of our country's experience data, we find that, even though government expenditure is considered, tax burden obviously has a negative effect on economic growth, which will have a very large divergence under two kinds of settings. When government expenditure is not considered, if tax burden increases one percent, the economic growth will decrease by 0.713%. When government expenditure is considered, however, the constraint of tax on economic growth will be dropping from 0.713 to 0.33%. Following the same logic, the paper also calculates the most suitable tax burden in China at present on the basis of Barrow Model. Through computation, our conclusion is that the medium caliber tax burden is approximately 18.6% without considering government expenditure, however, it rises to 20.3% or so when government expenditure is taken into consideration.

Key words: tax burden; economic growth